

## 評介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臺北：國史館，2010年，436頁。

蕭雅宏\*\*

### 一、前言

近年學術機構史的著作推陳出新，例如易杜強（John Israel）《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蘇雲峰《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皆屬學界佳作。透過上述的專書呈現，彷彿弦歌不輟的西南聯大、朝氣蓬勃的清華校園，以及戰後重建的臺大於眼前重現。誠然，一部理想完整的校史或院史，不單是教育史或學術史的爬梳，其先決的寫作條件有二項：第一是檔案文獻的網羅蒐集，以及對史料的判讀能力；第二是對其發展出的學術脈絡與內在理路（inner logic）必須要有全面性的理解，即所謂知人論事。而一般的學術機構史，有的只是徵集史料文物的校史室、教師校友集體創作的回憶錄、或展示相冊之類；或正進行中的口述歷史計畫。<sup>1</sup> 作為我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對

---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指正，特此致謝。修改期間幾位熱心師長提供意見，讓我對學術思想史有更多認識；至於內文謬誤則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13年8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12月3日。

\*\* 國史館采集處科員

<sup>1</sup> 如國防醫學院的「百年院史」計畫、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與臺中榮民總醫院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口述歷史訪談計畫。

於早年在中國大陸時期歷史，除「八十週年院史」之外，並無太多著墨；<sup>2</sup> 本書《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的問世可說是補足了這個缺憾，對顛沛流離的關鍵年代有更深一層體會。

作者黃麗安，2008年獲北京大學博士，主修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本書為其博士論文〈朱家驊之學術理想及其實踐〉所改寫「壓縮」而成（作者語），2009年獲得國史館（Academia Historica）第一屆國史研究獎勵補助出版，故本書的學術水準與作者功力是可以想見的。傳主朱家驊（1893-1963），民初浙江人，留學德國習古生物學，獲柏林大學博士，欲以科學救國淑世；回國後歷任黨政教育要職，於抗戰前出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其後代理院長近18年，為迄今歷任主事者任期最久；而一生所奉獻心力予中央研究院的時間，又與對日抗戰、國共和戰及國府遷臺等重要史事重疊。以往限於時空環境，或受限於材料零散，對朱家驊與早年的中央研究院認識不多；作者負笈北京數載，網羅兩岸有關朱家驊的檔案史料，透過鉅細靡遺的排比鋪陳，不但為中央研究院前30年院史（1928-1957年）下一註解；也介紹傳主生平事蹟及給予適當評價。

## 二、內容

本書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 4 章。緒論包含引言、選題旨趣、研究思路與研究資料來源及架構概述。作者對傳主朱家驊的生平與研究現況，與全書基本寫作有概略說明。

第一章「朱家驊與創建時期的中研院（1927-1938年）」，敘述中央研究院於蔡元培院長任內的建設，與朱家驊接任總幹事前後的背景。先是1927年蔡元培計畫的學術重鎮「大學院」失敗，1928年中國科學社的任鴻雋、楊銓、趙元任等人深感近代中國不及泰西，原因在於缺乏一個代表「國家學院」（Academy of

<sup>2</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2008年出版「八十週年院史全集」3卷，分為院長、各所中心與大事紀，內容資料詳實，約略於本書作者寫作同時。參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

Science) 的機構，因而倡議比照英國皇家學會、法國法蘭西科學院，推動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欲為此後學術菁英團體的代名詞。其次，蔡元培設定中央研究院的學風為「學術自由」與「學人治院」，在1930年代國民政府訓政時期「以黨領政」下誠屬不易，此舉影響中央研究院的治學傳統迄今；蔡又訂定中央研究院為「精研工作」，與大學研究所有所區別；「工作旨趣」為理論與應用並重，學術獎勵辦法等項；並以評議會為聯絡國內高等學府的組織，與選舉院士會前的準備。簡言之，蔡元培在任13年，設置了10個研究所，為中央研究院奠定了良好基礎，影響日後深遠。

朱家驊的登場與中央研究院的結緣，為就任地質研究所的籌備委員，協助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籌備會建議大院英文為Academia Sinica，並主導中英庚款會補助中央研究院設備。1936年朱家驊在丁文江逝世後，眾人力拱下任總幹事；對此有雄心壯志的朱，推動在南京院區「研究本部」的成立；惟因對日戰事而中斷。1938年，朱家驊又認為雲南昆明一地，地利人和，可發展為西南「研究本部」，要求各所集中辦公、播遷；運用其黨政關係，於戰爭期間排除困難，協助人事設備遷移；並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共事，搭配得宜。

第二章「抗戰期間守成不易（1940-1945年）」。本章從1940年蔡元培逝世開始談起，學界屬意朱家驊、胡適、翁文灝、王世杰與任鴻雋等5人為繼任人選。經評議會討論後，決議推舉胡適、王世杰與翁文灝為候選人；再經會前會（按：今日之假投票）選出前3名，依序為翁文灝、胡適與朱家驊，依法由國民政府主席圈選。當時蔣中正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袖，認為翁、朱2人於經濟與教育皆有重任，擬請胡適回國就任；惟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責任重大，蔣亦下不了決心，延宕半年多，終於9月任命朱家驊為代理院長一職。作者引用時人評論，認為朱能當選因「北大與中大、委座信任」；傅斯年也說：「若與政府太無關係亦圈不上」。朱家驊上任後，落實中央研究院聯絡、推廣科學研究任務；充實設備與網羅人才；側重西南研究等3項為積極戰時政策。惟新官上任之際，亦遭遇到若干困難：第一是人事問題與經費窘困。對日抗戰曠日耗久，總幹事一職，朱家驊尋覓接班人，終於說服傅斯年兼任；經費方面也因戰時大打折扣，朱憑藉個人能力向中央爭取，使得1941年追加預算較以往順利。第二是播遷問題。當對日作戰方酣之際，政府機關無不向西南大後方撤退，中央研究院播遷地點、經費與車輛有

賴朱與傅 2 人張羅，終能成行。第三為困境中求發展。近代中國積漸所至，重應用科學而輕理論研究，朱家驊為導正觀念，推動基礎科學研究單位的設立；此一時期設立了數學、醫學、體質人類學與植物研究所等，並於艱困年代加強與海外交流，與力保中央研究院不被改隸、「降格」於教育部、考試院。

第三章「戰後國家學院理想之逐步推進（1945-1949年）」。本章作者定義為中央研究院學術進展最順利的時期，因朱家驊身兼教育部長，可用資源頗多；加以抗戰勝利後局勢穩定，中央研究院迅速復員。此階段發展重點有三：一是接收日本遺留設備以為充實；二是發展中國原子能計畫；三是仿造歐美先進國家學術機構，成立院士會作為最高學術象徵。惟上述 3 項，實際上並非全部順利，分述如下：

朱家驊以教長之尊，欲接收日本敵偽資源，料想不難；惟事與願違，先是位於臺灣中央研究所，為日本臺灣總督府所管，農林業多達 4 部 11 支所；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不肯鬆手，兩人大打筆仗，遲至 1948 年陳儀仍然掌握。東北長春的大陸科學院，亦有 800 餘人規模，行政院卻指定由經濟部接收；經此兩役，朱頗感受挫，但仍爭取到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與近代科學圖書館，並安排院內同仁復員返回南京，清理院區與修繕宿舍，成果尚可，其時傅斯年還以為「流離可說是告一段落了」。再者，發展中國原子能計畫亦不如預期；自 1945 年美國投擲原子彈的震撼威力，終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也使世人見證了科學救國；原子能作為國防軍事用途，乃至於富國強兵意義；中央研究院作為最高科研機構，發展原子能責無旁貸。朱家驊以茲事體大，苦於經費短缺，認為以現有數學、物理、化學等研究所之基礎，若能與國防部聯手必然成事。惟軍方主事者以機密為由，不願合作；海外人才方面亦延攬不順，遲至 1948 年儀器才分批運抵；然而國共戰起，朱苦心造詣託名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終於功敗垂成。

朱家驊心目中的「國家學院」時代，隨著抗戰勝利而到來；重頭戲為選舉全國第一屆院士，此舉為中央研究院成立 20 年的重大成果，亦為中國歷史上的創舉，象徵學術發展趨於一流水準，與歐洲傳統看齊。歷經法令修訂、公告、評議會投票與補選後，終於選出 81 名院士；院士會議開幕當天，蔣中正還親臨祝賀。惟美中不足的是國共鬭牆，烽火再起，1948 年底朱與傅斯年等幾位所長討論戰況

時局，選定臺灣為最後的根據地；隨著軍事與經濟的潰敗，中央研究院人心浮動，各所主事者於鼎革之際、去留之間，意見頗為分歧，如社會所長陶孟和表明仍留中國大陸；許多同仁無心搬遷敷衍塞責；朱原先還樂觀認為，保留一線生機於重慶、廣州等地作為聯絡處，盤算徐圖，最後情勢只感徒呼負負。

第四章「在臺重建學術研究中心之努力（1949-1957年）」。本章以政府遷臺前後，中央研究院面臨危急存亡之秋為主軸；先是朱家驊於1949年底抵臺，面對大院僅剩歷史語言、數學兩所渡海處境，力求現有基礎再圖恢復。但時局動盪之際，所面臨困難更勝於抗戰之際；其一為無地可駐，文物設備散布桃園楊梅倉庫，研究人員與家眷賃居民宅，或借住醫院病房，顛沛流離更勝以往。其二為無經費，戰亂漂泊之時，渠等行文教育部與臺灣省政府不得要領，皆感求助無門；延宕4月餘，終得行政院交辦款項。惟期間臺灣物價波動，同仁生計頗感四顧茫然，面對政經變局諸多掣肘，朱本人雖曾萌生退志，終究還是苦撐到底。

朱家驊先於同年辭去所有兼職，專心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事。第一為爭取外援，即向美國有關學術機構爭取贊助，經過多方交涉，中基會與美國洛氏基金會分別撥下補助款，行政院也分期撥下經費，金額不大，但終解燃眉之急。第二為籌建南港院區，此案奠定了未來數十年間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南港一地，就氣候條件與腹地面積皆為當時首選，朱家驊捨木柵而選南港，實則前瞻，在經費無虞之下，終於在1954年第一期工程院舍如期完工，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得以從楊梅搬到臺北南港，結束飄零生活，對心情實有安定作用。其次，朱家驊也試圖復所與籌建新的研究所，為中央研究院擴大規模。1954年7月第一個復所即植物研究所，1955年8月設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1956年後更設化學研究所、動物研究所籌備處。而抱病之餘，力陳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之必要性，也向美國亞洲基金會饒大衛氏爭取到1萬美元，作為近代史研究所籌備時期圖書資料經費。惟近代史研究所籌建之際，流言蜚語不斷；蓋傳統文人相輕，以及「金援」令人分外眼紅；朱為學術發展請命，力排眾議，近代史研究所方在憂患歲月裡生存下來。

中央研究院遷臺後另一個困難為院士會議與評議會，由於若干研究人員滯留中國大陸，「法統」的延續遂成一重要課題。1954年朱家驊聽從王寵惠的建議，以報到人數代替全體人數，解決了懸而未決的問題；又於1955年在紐約召開北美

院士談話會，邀集海外院士商談中央研究院現況與中長程發展計畫，並達成集會辦法共識。朱遂於1957年在南港舉辦第二次院士會議，並於會後運作召開評議會，順利選出34位院士候選人，惟院士選舉為隔年新任院長胡適所主持，其時朱已稱病提出辭呈。本章最後以朱家驊的去職作為結尾，朱身為中英文教會董事長，1956年曾動用一筆20萬美元，立意良好作為補助中央研究院權宜之計，未料遭到董事劉瑞恆、杭立武等人的反對，朱雖堅持己見，並修改規章「追認」，豈知此舉種下違法的導火線。有心人士藉機在蔣中正身旁讒言，蔣於週末微服出巡中央研究院，以無人接待與施工延宕等細故，示意朱家驊知所進退；雖然在代理總幹事與研究人員力爭慰留下，朱仍展現讀書人的風骨，未曾眷戀，掛冠求去。

結論方面，作者分為「學術理想之實踐」與「學術與政治之間」兩部分簡述。綜合朱家驊與早年中央研究院的歷程，前者認為中央研究院創立於蔡元培，定型於朱家驊；後者則以朱自身評論，認為從政30餘年未能潛心向學，以至於功業無成。最後作者總評，以朱雖棄學從政，未達理想，但所作所為不遜於純學人；再引用王世杰、胡適、沈剛伯等時人語錄對其肯定。

### 三、特色

宋人云：「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難。」在作者娓娓道來，朱家驊給讀者的感覺，歷任黨務、政治、學術、教育等職都未能符合自己的志趣，唯有承乏中央研究院行政工作一事，真正做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界，閱畢全書，彷彿朱的一生與中央研究院的前30年成為生命共同體。作者在本書展現了通識與專精的史學方法，將相關史料網羅殆盡，透過以傳主為主的排比鋪陳，相關人物的記載，將當年中央研究院肇建時隱晦的人、事、物繪聲繪影，猶如活靈活現呼之欲出，面對文獻潛心思索，難能可貴。茲分述特色如下：

（一）通識廣博：中央研究院成立之際，法令沿革與業務職掌由來，或信而無徵、或湮沒於世，現存院史對早期人事亦未能全面爬梳。作者以考證學派的訓練方式，從蔡元培以降各研究所、評議會、院士會，以至於總辦事處總幹事等職，分別深入理解，即使理、工、醫、農等科背景不同，從文中可看出花費心思

鑽研。其次，中央研究院前40年適逢國難，多次院所播遷、人事更迭，從故紙堆裡分析大院變革與主事者興替，誠然對歷史具有相當功力。例如第一章提到，1936年朱家驊初任總幹事，方擬「學術研究中心」為目標，訂立三階段計畫：「完成籌備期」、「集中建設期」、「擴充範圍期」，此題引用胡適、顧毓琇、莊長恭等人信件函電檔案，反覆考證，才推測出朱的內心世界。又如第三章講抗戰勝利後，中國舉國掀起原子彈試驗熱潮，以為科學救國；作者在這方面的史料盡可能的蒐集，然後給讀者講故事般的深入淺出，都可看出通識淵博。

（二）專精深入：例如1949年國共鼎革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左陷大澤中」（陶希聖語），此變局歷來為思想史最佳的研究題材；作者在第三章裡，將中央研究院去留未定的各所主事者與同仁，其心態與行徑描述極為貼切，如社會所長陶孟和堅持不走，嘗言「朱家驊是我的學生，別人不敢頂，我敢」，另一位地質所主事者李四光則說道：任有志者前往，個人絕不贊成；同仁模稜兩可的「磨洋工」敷衍（頁263），此類描寫，都能讓讀者感受大時代的氛圍。朱家驊為搶救學人，大費周章，擬除臺灣外於重慶另起爐灶，此舉與傅斯年不合，以至於痛心疾首；作者引用《朱家驊檔案》原文，可見字字珠璣。（頁271-272）運用史料與剪裁工夫得宜，才能將奔騰年代菁英的心態如數家珍。

（三）參考資料詳盡：作者所使用的參考資料遍及海峽兩岸檔案、報刊雜誌、中央研究院史料、史料彙編、工具書、年譜、日記、書信、回憶錄；以及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著、外文資料；甚至作者親身操作「口述訪談」，訪問朱家驊祕書與中央研究院老人，得到寶貴材料。附帶一提，作者於緒論中提到：臺灣歷來對朱家驊的研究「多讚譽有加，對負面未曾提及」、中國大陸「過度貶抑」（頁5），然而讀完全書後，只感作者對朱的評價亦是處處迴護，持正面居多；若干爭議如動用款項、黨政運作與政隨人轉等便宜行事，或可採取更客觀分析。茲舉一例：1938年為朱家驊兼職最多時期，除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外，尚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中央黨部祕書長、中央調查統計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兼代書記長、中英庚款會董事長等兼職。還不包含前一年底辭去的浙江省主席。作者認為兼職過多「難見其功」，仍試圖述說朱此一時期，對中央研究院的貢獻有「保全」之功；實則朱已「居其名」分身乏術，心力浪擲，當時皆為代理總幹事傅斯年行事，最後朱因「分身乏術」而自動宣布暫辭總

幹事。<sup>3</sup>

## 四、商榷

本書規模宏大，架構分明，超過20萬字的論述，作者欲從朱家驊功業探求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又想從中央研究院的播遷過程，旁敲側擊朱家驊的心境，夾敘夾議頗有可觀之處。惟論文改寫成專書，字裡行間眉目頗有不清爽處；幾項想法與作者商榷：

第一章關於中央研究院成立時間並未提及。作者於本章只提到蔡元培辭去大學院院長，至於何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或組織調整？頗感霧裡看花（頁34-35、54-55、59）；筆者只能從中推斷，成立時間約為1928年2月後，實際日期還得檢索前面提過的《八十週年院史》方能得知。第二章關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人選。作者提到蔡元培過世後，蔣中正原屬意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汪兆銘派大將顧孟餘繼任，因中央研究院同人反對未果；其後曾考慮胡適，最後才在翁文灝與朱家驊二者中選定朱家驊（頁117）。<sup>4</sup> 此節作者花了極大篇幅，說明胡適未能就職的原因，與中央研究院同仁深怕胡適返國，而不利外交有關。不過，試問以蔣中正之高位洞見觀瞻，兩權相害，他會不知道其中關係嗎？作者在分析政學背景與可能原因後，似乎忽略了蔣圈選朱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的用意，以朱的黨籍身分與資歷，是否蔣也有意以黨政遙控最高學術機構呢？另外，蔣於1943年11月國府主席林森去世後，才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為何早於1940年能介入影響中央研究院院長人事？作者於此處應交代來龍去脈。

還有幾點可討論處：其一，背景未能交待清楚，作者寫作時，以為順理成章想當然耳。歷史寫作，首要脈絡分明，尤其是學術史，不能寄望讀者既有知識背

---

<sup>3</sup> 有關朱家驊與傅斯年關係，近年新出版《傅斯年遺札》足資參考。見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sup>4</sup> 如時人《翁文灝日記》、《竺可楨日記》對於1940年選舉院長一事都有不同見解；又如前面提到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書中對於院長選舉，與作者立場有異，應當參考。

景。如書中提到：傅斯年說昆明有「好東西」（頁165），讀者只感不知所云。又如朱家驊來臺後，前4年完成「半件事」（頁283），此半件事所指為何？論朱家驊的理念說「王學之功，不在禹下」（頁369），所指為何？是否在註腳處說明較佳。此外，第一次院士選舉紛擾，時人有「諸子皆出於王官」之慨，<sup>5</sup> 作者僅引用傅斯年的評語作結。類似的史實過於簡略者，可再詳細說明。

其二，為若干重大事件略過不提，不知作者用意。如總幹事楊銓（杏佛）被刺，當時輿論大驚，這點是否影響朱家驊接任總幹事的意願與其後作為？又如抗戰後期，朱家驊向蔣中正獻「九鼎」一事，捲入是非政爭，歷來論者眾說紛紜，作者也未交代。<sup>6</sup> 此外，按李宗仁的說法：其代理總統任內，朱家驊曾試圖作為蔣、李二人間的調停人；蔣李之爭，國民政府存亡之際，朱家驊還曾受邀入閩錫山內閣，擺明幫助李宗仁，因此埋下日後蔣對朱家驊的不滿，是否與來臺後備受冷落，與後來去職有關？作者僅在註腳以「有人說」帶過，若把此事與「九鼎」串聯，蔣對朱的評價恐怕從1943年起就有偏見。

本書另有一些小瑕疵，如作者說朱家驊「默察大局，已知留臺年月將甚漫長」、「七年之病欲求三年之艾」，上述兩段話皆無史料佐證，究竟是朱的內心世界？還是作者的猜想？其次，第三章提及，滯留在中國大陸的中央研究院同仁，為「新中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主力」，此話不差；但「同屬一個中國的學術文化連接臍帶」，未免過度衍申；以陳寅恪為例，終身不信奉馬列主義、不願赴任可為反證。第四章第三節標題「奠定在臺學術研究之基礎」，內容大多為朱家驊的去職始末，明顯與題意不合。又如第四章後作者每用「史數所」的簡稱，從未耳聞（頁283），按理應分別稱歷史語言研究所、數學研究所，如此用法易造成誤解。「佛菩薩」不知所指為何？（頁103）；「感佩函」一詞（頁338）恐是中國大陸近年用語；清初，應為清代較妥（頁380）；「氣」油應為汽油（頁169）、第四章註126亦誤打（頁348）；上述手民之誤，瑕不掩瑜；若能於書末增補「朱家驊年表」、「中央研究院各所大事記」相互對照，相信更有助於讀者

<sup>5</sup> 可參考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88-89。

<sup>6</sup> 見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所藏《一般檔案》內之〈呈獻總裁九鼎及獻鼎詞〉，檔號：一般170/528，或〈蔣主席斥獻九鼎之經過〉，檔號：一般120/22。

理解中央研究院院史。讀完本書，顯見朱家驊的理念與成績；讓人想起現今南港中央研究院行政大樓的一副對聯：「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可作為朱家驊其人其事註腳。